

· 专题研究 ·

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与新村主义

祁 建 民

〔摘要〕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运动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经历。以往学界相关研究多用“传入—反响”模式，仅将其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问题来加以研究，而对于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践行的新村主义与日本新村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缺乏分析。本文通过对中日新村主义运动的比较，认为中日新村主义不但实质内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在两国所发生的影响和结局也大不一样。日本新村主义运动强调自我，不触动原有社会制度，虽然历经 90 余年，但仍然存留下来。而中国新村主义的实践者则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索、奋进。他们正是以新村运动的失败为契机，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成功。

〔关键词〕新村主义；中日比较；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武者小路实笃

〔中图分类号〕D231；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8)-06-0048-16

You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New Village Ideal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Qi Jianmin

Abstract: The New Village Ideal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experience for many young intellectuals that assisted in their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e past, relevant research in academic circles has been based on an “introduction and response” model, and it was only regarded as an issue of research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foreign ideas in China. There was a lack of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Village Ideal practiced by Chinese you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Japanese New Village Doctrine.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s in China and Japan, considering not only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ubstantive contents of the movement in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their different impacts and outcomes. The Japanese New Village Movement emphasized the ego and did not focus on the original social system. Although 90 years have already passed, the movement continues to exist. The practitioners of China’s New Village Ideal assumed responsibility for remolding society and sought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and forge ahead. They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its failure to embark on the road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hich eventually proved to be successful.

五四时期，大量国外思想纷纷进入中国。这时，在西方思想界本来已经发生了从反封建的启蒙学说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种转变。但是在中国，大量西方思想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几乎是同时平行地涌入，由此造成中国思想界新旧交错、兼容并蓄的局面。新村^①主义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由于其既含有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也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和东方观念等多重因素，^②因而产

生广泛共鸣。加上新村运动起源于近在咫尺的日本，便于中国思想界了解，故能得以迅速传

- ① 五四时期的“新村”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泛指未来理想社会，狭义是专指日本式新村。
- ② 台湾学者周昌龙认为：中国的新村运动是西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和东方老庄思想、大同思想及“桃花源”理想的综合体。参见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台湾时报文化，1995年，第238—239页。

播。^① 新村主义是中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后来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经历，中共第一批党员中有许多人就曾是新村主义的赞同者或实践者。即使是他们后来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其所放弃的主要是新村主义改造社会的方法，但这一主义所揭示出的理想社会蓝图却丰富了他们后来对于美好世界的畅想。美国学者周策纵就认为：新村主义的经验影响了他们日后对社会问题的想法^②。而李少兵则指出：新村主义所揭示的对于未来社会的向往，后来融入到他们最终接受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中^③。梁心也认为：新村运动活跃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路却长期发挥着影响^④。

以往学界关于新村主义，多用“传入—反响”模式，仅将其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加以研究。其中，彭明认为：由于新村主义描述的田园诗一般的生活显得很具体而最易为人模仿，故在青年中盛行。^⑤ 吴雁南等人则认为：新村运动是五四青年对一种新制度、新生活的试验。^⑥ 在对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研究中也涉及他们实践新村主义的经历。^⑦ 近年间，赵泓对于大同思想、泛劳动主义与新村主义的关系有过系统的梳理。^⑧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对于日本新村主义的实质及其背景缺乏关注。例如，武者小路实笃倡导新村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和暴力革命的出现，因此他反复强调新村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但是，由于中国许多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曾经接受并实践过新村主义，再加上新村主义的一些主张与空想社会主义类似，故而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把新村主义纳入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其中，彭明就把新村主义视为“一幅美妙的共产主义‘蓝图’”。^⑨ 吴雁南等人也认为：“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广泛影响到中国思想界的一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⑩ 钱理群也指出：周作人宣传的“人学”及新村主义带有鲜明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⑪ 以上学者之所以作此论，既有对日本新村主义的误读，同时也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中日新村主义的重大差异。

日本学界关于新村主义创始人武者小路实笃^⑫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积累。其中，阿部军治认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深受托尔斯泰影响。^⑬

- ① 钱理群认为，五四时期，几乎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开始都不同程度地为空想社会主义所吸引。钱理群《周作人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页。美国学者周策纵曾提出，五四时期的新社团几乎都表现有理想主义色彩。（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岳麓书社，1999年，第275—276页。日本学者尾崎文昭也认为，五四时期新村主义确实吸引了广大青年。尾崎文昭：「周作人の新村提唱とその波紋（上）——五四退潮期の文学状況（一）」明治大学教養論集刊行会『明治大学教養論集』第207号、明治大学教養論集刊行会、1988。
- ② （美）周策纵，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第275—276页。
- ③ 李少兵：《“五四”时期新村主义新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
- ④ 梁心：《“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像》，《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2期。
- ⑤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5—506页。
- ⑥ 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4页。
- ⑦ 参见文热心：《青年毛泽东之路：岳麓“新村梦”》，红网 <http://tour.rednet.cn/c>，2016年5月7日。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 ⑧ 参见赵泓：《中国人的新村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
- ⑨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第499、503页。
- ⑩ 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第356页。
- ⑪ 钱理群《周作人传》，华文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
- ⑫ 武者小路实笃，1885年（明治十八年）出生于东京，卒于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是子爵武者小路实世的8个孩子中的最小的。武者小路家本是藤原氏后裔。武者小路实世早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曾参与明治宪法制定，但37岁时早逝。武者小路实笃年少时深受其舅父勸解小路资承的影响。勸解小路资承本为子爵，公司经营失败后在三浦半岛农村生活，受托尔斯泰思想影响，同当地渔民、农民密切交往。少年武者小路实笃经常去那里，与众多表兄弟姐妹度过愉快的乡间生活，这大概就是武者小路实笃后来新村设想的生活经验。参见奥脇賢三：『検証「新しき村」』農文協、1998年、35—37頁。
- ⑬ 参见阿部军治『白樺派とトルストイ 武者小路実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を中心に』彩流社、2008年、128—140頁。

但是，也有人认为：武者小路实笃后来摆脱了托尔斯泰思想，提倡共生观念。^① 还有人认为武者小路实笃具有“人类爱”的宗教思想。^② 对于日本新村的发展历程及其内部矛盾也有实证性研究。^③ 现在日本依然存在的新村组织对于武者小路实笃的思想及其业绩有过系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④ 但是，日本学者所关注的重点是在日本思想史和文学史范围内，基本不涉及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其实，近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中，关于周作人与新村主义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有学者提出：五四时期周作人宣传新村主义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革命的到来而要预防。^⑤ 其提倡新村的出发点是“人的全部发展”论。^⑥ 周作人关于“人的生活”构想就是过一种互助和平的生活。^⑦ 其新村思想与其基督教观念相关。^⑧ 周作人把个人主义看成是第一性的。^⑨ 与此相关，有人认为鲁迅对于新村没有兴趣^⑩，但也有人提出鲁迅对新村是肯定的^⑪，更有人认为周作人比武者小路更具有理想化色彩。^⑫ 在日本的相关方面，对于周作人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不在少数。例如，有人认为周作人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来主张和平与非暴力。^⑬ 其实，他受到主张自恋和自爱的英国葛理思（Henry Havelock Ellis）的影响更大。^⑭ 周作人的伦理个人主义与武者小路实笃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⑮ 其妇女解放、家庭观念与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亦有所不同。^⑯ 他对于中国将来发生的革命既有期待也有忧虑。^⑰ 周作人与李大钊不同，他没能从追求个性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的层次。^⑱

可以看出，以往的这些研究是分别在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史领域内展开的，虽然也有对周作人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比较，但这种比较很少从中日之间宏观背景和思潮演化上进行分析。关于周作人的研究也仅限于他对新村主义的传播动机以及他的思想状态。对于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理解、践行的新村主义与日本新村主义以及周作人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是缺乏比较研究的。

鉴于以上，本文将专门对五四时期新村主

义在两国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中国新村运动

- ① 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実篤、新しき村の生誕』 武蔵野書房、2008年、8—9頁。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実篤論』 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実篤研究 実篤と新しき村』 明治書院、1997年。
- ② 寺澤浩樹 『武者小路実篤の研究 美と宗教の様式』 翰林書房、2010年、42—43頁。
- ③ 奥脇賢三 『検証「新しき村」』 農文協、1998年。
- ④ 主要有武者小路実篤著、渡辺貫二編 『新しき村の誕生と生長』 新しき村発行、1992年。武者小路実篤著、渡辺貫二編 『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 新しき村発行、1994年。渡辺貫二編 『武者小路実篤九十年 年譜風略伝』 新しき村発行、1995年。渡辺貫二編 『年表形式による新しき村の八十年』 新しき村発行、1999年。
- ⑤ 参见徐从辉编 《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黄开发 《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相关研究还有董炳月：《周作人与〈新村〉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
- ⑥ 钱理群 《周作人论》，第11页。
- ⑦ 倪墨炎 《“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0—81页。倪墨炎 《周作人宣传新村运动及其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 ⑧ 参见止庵 《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95—96页。
- ⑨ 参见黄开发 《周作人精神肖像》，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 ⑩ 参见钱理群 《周作人论》，第11—12页。
- ⑪ 参见倪墨炎 《“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85页。
- ⑫ 参见于洋 《论周作人与武者小路实篤“新村主义”的异同》，《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 ⑬ 参见劉岸偉 『周作人伝 ある知日派文人の精神史』 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年、150頁。
- ⑭ 参见顧偉良 『周作人におけるユートピア精神』、『弘前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第46号、2010年。
- ⑮ 参见尾崎文昭 『周作人の新村提唱とその波紋（上）一五四退潮期の文学状況（一）』。尾崎文昭：『周作人の新村提唱とその波紋（下）一五四退潮期の文学状況（一）』 明治大学教養論集刊行会『明治大学教養論集』第237号、明治大学教養論集刊行会、1991。
- ⑯ 参见中山義弘 『五四運動期における「新しき村」の試み』、『北九州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40巻、1979年。
- ⑰ 参见細谷草子 『五・四新文学の理念と白樺派の人道主義』、中国文芸研究会編『野草』1号、1970年10月。
- ⑱ 参见樋口進 『周作人試論』、『目加田誠博士還暦記念 中国学論集』 株式会社大安、1964年、361—364頁。

实践者主体对于新村主义的理解、实验及其与日本新村主义的重大区别等问题进行分析,以便更加全面认识中国五四时期新村主义的实质及其意义。另外,笔者曾经两次对日本现存的新村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与中国新村运动盛极一时却又迅速消失的历程相比,日本的新村历经90余年后依然留存。笔者认为:中日新村发展的这种不同结局也值得追溯历史、加以深思。有意思的是,中国一些研究新村主义的著作,从中国的经验和资料出发主观地认为日本新村不会长久,^①甚至说日本的“新村不能再维持下去,终于解散了”^②。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推断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于日本新村主义的性质和历史的了解还是明显不够的。

一、日本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武者小路实笃,贵族出身,早年从学习院毕业后考进东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学习。但由于对大学教育失望不久便退学,从此专心文学写作。他的文学和社会思想深受西方影响并且前后变化较大,早年沉迷于托尔斯泰,对其禁欲主张、赞美劳动以及反国家主义的观点十分赞赏,但后来又主张唯美主义。近代日本文学界竭力模仿西方,不过在浪漫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又迎来自然主义文学。当自然主义文学席卷日本文坛仅仅数年后,作为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反动,又出现了唯美主义,其代表就是白桦派。^③武者小路实笃便是白桦派的主要人物。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武者小路等创刊《白桦》杂志,主张自然是万物的创造主,是生命的化身。他们赞美自然生命,提倡自我主义。这时的武者小路实笃十分信奉莫里斯·梅特林克、罗丹、沃尔特·惠特曼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开始思考社会正义问题并探讨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他认为自然之后的第二个规范即“人类”,在人类社会应提倡“爱”与“连带”。他提出在俄国革命之后再出现的应该是由独立的个人相互协助而形成的社会,于是开始倡导建立共生农园,企图以此创造出一种共生社会。^④

1918年,武者小路实笃一连写出三篇关于新村的对话,标志着其新村主义的形成。《第一对话》^⑤是对理想国的描写。那里资本共有,人们各自尽作为人类的义务,从事劳动,其基本生活需要皆免费,社会保障普及。《第二对话》^⑥中提出建立新村的方法,即先由少数人拿出基金购买土地,建立共劳共生的社会集团即新村。他提出建立新村的基本原则是:从现存社会制度中建立理想社会,不同现存制度发生冲突;坚持和平革命,依靠理性和爱的力量;要从文笔理想家变为劳动的理想家。《第三对话》^⑦则提出改造国家与世界的愿景。他特别强调新村成员的精神建设,把重心从社会变革转为人的精神改造。^⑧

新村主义与当时中国热衷探求理想社会的时代特征相符。辛亥革命推翻了长期延续的封建帝制。为了建立新的理想国家,中国人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并开始试验。早在20世纪初,中国就出现大量社会幻想小说,设想各种乌托邦社会。但是,这些幻想小说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不是把当时的西方文明模式直接投射到中国,就是幻想着中国重新回到过去的辉煌。^⑨康有为的《大同书》也揭示出了一个超前理想社会的轮廓。而十分厌恶旧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则要

-
- ① 例如,彭明认为:“日本的这第一座新村,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从周作人介绍该村的经费状况来看,似乎也没有存在多久。”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第505页。
 - ② 倪墨炎《“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第83页。
 - ③ 参见安藤宏《日本近代小说史》中公选书,2015年,64—101页。
 - ④ 关于武者小路实笃的思想历程,可参见天津山国夫:《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誕》武蔵野書房,2008年。
 - ⑤ 原题《某个国》,在《大阪每日新闻》晚刊7月12日到21日连载发表。
 - ⑥ 原题《进入新生活的道路》在《白桦》5月号发表。
 - ⑦ 原题《进入新生活的道路二》在《白桦》6月号发表。
 - ⑧ 参见天津山国夫《武者小路实笃研究 实笃と新しき村》,33页。
 - ⑨ 参见冯鹤《晚清·想像·小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3—131页。

“另辟新境”，再造一个理想社会^①，特别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已开始着手乌托邦的试验。

新村主义首先是由周作人介绍来的，这与他当时的思想状态相关。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关注白桦派，与鲁迅一起翻译白桦派作品，传播人道主义。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大力倡导个人主义。他把日本新村运动视为其文学主张的现实体现。这时的周作人一方面积极投入“新文学”运动，宣传西方人道主义，批判“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②；另一方面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对于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产生了“期待革命而又忧虑”的心情^③。而新村主义则一方面满足了其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被他认为是应对将来革命的最好方法，所以竭力提倡。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根据武者小路实笃《新村的生活》和《新村的说明及其会则》等内容所撰写的《日本的新村》一文，率先将新村主义介绍到中国。7月，他来到日本新村停留数日，亲自体验了这种生活并以新村村外会员身份加入新村。回国后，他在《新潮》2卷1号上发表了《访日本新村记》，其文笔细腻抒情，颇能打动人心。由此，他也成了宣传新村的代表人物。

有人认为：周作人倡导新村与其当时温暖的大家族生活有关^④。1919年，鲁迅在北京找房子，要将母亲和三兄弟搬到一起居住，他们相爱互助，成立“文学合作社”，合作翻译、写作，共同生活。这种状况对于周作人提倡新村主义也不无影响。^⑤

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的宣传迅速引起很大反响，并得到李大钊等人的支持。在当时的《新青年》《少年中国》《东方杂志》《新潮》《国民》《民国日报》《批评》《新人》等报刊上，登载了大量宣传和讨论新村主义的文章。《批评》杂志还专门发表“新村号”，讨论新村问题。1920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刊登启事，宣布设立新村北京支部，吸引许多青年来访。这时，李大钊也十分关注新村运动，经常与周作人就新村问题进行交流，鼓励青年参与

新村运动。在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时，李大钊也肯定了新村试验。^⑥

这样，新村主义就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不过，由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城市生活，新村运动便以城市工读互助团的形式来进行实验。1919年12月4日，在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发了王光祈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倡导在城市建立新村。不久，便有工读互助团陆续成立。

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成为新村运动的主力。黄日葵、康白情等人组成北京大学访日团，访问东京新村支部。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后，受新村主义影响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成立工读同志会，半工半读，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他在致周世钊的信中具体阐述了对于新村的设想。^⑦1920年5月，毛泽东同彭璜等又在上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⑧新民学会的会员有十余人到法国后继续工读实践，而其中的蔡和森经常与毛泽东通信交流。^⑨恽代英对于新村运动十分热心。1920年1月，他发表《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提出创办书报商店计划。^⑩他和林育南、林育英等在创办利群书社的同时，还在武昌设立利群毛巾厂，

- ① 梁心：《“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像》，《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2期。
- ② 周作人：《思想革命》，《谈虎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 ③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 ④ 孙郁：《鲁迅与周作人》，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88页。
- ⑤ 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5—38页。
- ⑥ 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9页。
- ⑧ 赵泓：《中国人的新村梦》，第104—105页。
- ⑨ 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泽东在湖南》，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09—110页。
- ⑩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进行共产生活试验^①。他们还准备在农村建立新村^②。施复亮（存统）1914年春则发表《非孝》一文，提出要以父母、子女之间的平等爱代替不平等的“孝”，在当地引起哗然。他离开浙江到北平后积极参加工读互助团，成为骨干。^③

新村运动为后来中共成立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中共早期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就曾是工读互助团的成员。1920年5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俞秀松、张太雷随后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在上海“工读互助团”中不到一个月就发展了30余名团员，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贺昌等。^④

不但是后来的许多中共重要人物当时热心新村，就连蒋介石也曾一时对新村感兴趣。1919年11月，他在日本看到社会主义流行后在日记中写道：“吾知其社会改革必不远也。”当得知新村运动并看了《新村记》一书后，他也有所触动，即萌生了“改造本乡”的念头。^⑤

虽然五四时期的新村和工读互助团试验不久都失败了，但是，也有个别人把新村坚持下来。例如王拱璧，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武者小路实笃结识，回国后在家乡河南陈州建立青年公学，实行“农教合一”，培养农村人才^⑥。再如傅柏翠，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受武者小路实笃思想影响，返回闽西家乡后进行新村试验，建立了农村共产团，开办农民夜校、信用合作社、手工厂等，还组织农民自卫军^⑦。一直持续了20多年。

二、个人主义的新村与非个人主义的新村

日本新村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作为中国新村运动实践者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所践行的新村与日本新村主义却存在着重大区别，这首先是在个人主义问题上。

武者小路实笃非常坚信个人主义。他本来十分崇拜托尔斯泰，提倡利他精神，但在接触到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思想后便脱离了托尔斯泰，说道：“我从此经常把‘为了自己’放在心头来行动”^⑧。他虽然也主张利己与利

他，自爱与他爱是一致的，但是他认为首先要立足于利己和自爱。“同情他人、为他人劳动的时候也有，但是那只限于同时也发挥自己内在的珍贵东西。”“与他人协作也仅限于不影响自己独立性的范围之内。”他反对为了信仰的献身精神，表明自己“不喜欢损害自己自尊心的宗教感伤”。^⑨他特别强调自我独立^⑩。他认为在理想社会里自我的自由最为重要，“没有必要为了吃、为了父母、为了家庭而出卖自己身体”^⑪。强调自我是最重要的。

个人主义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被提倡的启蒙思想之一。中国几千年来，个人都被“忠”“孝”等伦理规范严密束缚，被埋在庞大的伦常关系之中。所以个人的发现对于打破封建关系束缚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⑫周作人对于新村首先就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加以介绍的，他在当时十分热衷提倡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78页。

② 《恽代英日记》，第652—653页。

③ 米原謙「山川均と二人の中国人：施復亮と巴金」『甲南法学』57卷第3・4号、2017年3月。

④ 赵泓《中国人的新村梦》，第106页。

⑤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29页。

⑥ 王金玉、窦克武《王拱璧“新村生活”述评》，《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曲铁华、慈玲玲：《王拱璧“新村”教育思想及其本土化实践》，《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

⑦ 参见陈永发《“新村”梦碎：闽西古蛟四十年（1927—1962）》，陈永发主编《明清帝国及其近现代转型》，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陈耀煌《民国时期的农村社会与地方强人——傅柏翠与闽西地区》，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29期，2013年。张雪英《新农村建设史上的特殊篇章——傅柏翠新村建设的实践及其启示》，《龙岩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⑧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辺貫二編『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12頁。

⑨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について』、26頁。

⑩ 参见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について』、27頁。

⑪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辺貫二編『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46頁。

⑫ 耿云志《〈新青年〉与“个人”的发现一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惻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他認為：“若是割肉餵鷹，投身給餓虎吃，那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① 1920年11月，他在天津講演中也說：“人類的意志在生存與幸福。這也就是個人的目的。”^② 他批評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是“極端的利他沒殺了對於自己的責任。”^③ 所以，他的人道主義是以個人主義為前提，把個人主義看成是第一性的^④。“五四”之後，他依然停留在個人主義，甚至因此反對群眾運動。1924年他在《一封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信》中說：“我想現在最要緊的是提倡個人解放，凡事由個人自己負責去做，自己去解決，不要閒人在旁吆喝叫打。”^⑤

個人主義在中國並沒有一直興盛下去。有人指出：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發展的一般趨勢是逐漸擺脫歐美文化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影響，而向俄國愛國主義、人道主義靠攏，但是周作人卻一直熱衷於歐美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上，把個性解放的追求與人民解放的歷史要求對立起來^⑥。也有人批判說：周作人的人道主義是抽象的人的文學，以自我為中心，在社會鬥爭上妥協，最終為保全小我而出賣良心^⑦。

周作人的個人主義新村觀點與東方傳統文化有關。中西方歷史上都有烏托邦一類的思想。不過，有日本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的“桃花源”思想與西方的烏托邦思想有一個明顯的差別，這就是西方“烏托邦思想把重點放在共同體、社會的理想狀態上，而中國式的樂園思想卻首先是追求個人的安樂”^⑧。中國式烏托邦思想“追求成仙和隱逸，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是實現個人幸福的手段”^⑨。其結果，就是中國的傳統烏托邦思想倡導消極遁世、獨善其身。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就認為：“既缺乏歷史樂觀主義又缺乏政治上的積極行動，這也是中國傳統中的烏托邦傾向的特點。”^⑩ 周作人早期曾痴迷於“鄉間風景”，甚至有“隱居”和“終老”的感嘆^⑪。由此也可以窺見其個人主義避世隱逸思想的脈絡。

但是，個人主義的新村觀點，在當時的中

國就已經受到嚴厲的批判。胡適首先批評了周作人提倡的新村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他說：“這種生活，我認為‘獨善的個人主義’的一種。”“這個觀念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在於把個人看作一個可以提到社會外去改造的東西。”^⑫ 胡適的批評對於當時許多熱衷新村實驗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醒。

魯迅對於個人主義的新村也持懷疑態度。他認為：新村主義道路無法實現，“改革么，武器在那（哪）里？工讀么，工廠在那（哪）里”^⑬？他曾說：周作人宣傳新村的“不是什麼大文章、不必各處登載”^⑭。後來，有日本學者認為：與魯迅深刻了解社會的嚴酷現實不同，一直受魯迅庇護，不知艱辛的周作人把新村理想看得過於簡單、樂觀^⑮。因此，可以看出，周作人的人道主義只停留在觀念世界，而魯迅則發展到堅定的自我批判過程，開展了在社會集

- ① 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
- ②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
- ③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第6卷第3號，1919年3月。
- ④ 黃開發：《周作人精神肖像》，第13頁。
- ⑤ 周作人：《談虎集》，第113頁。
- ⑥ 錢理群：《周作人論》，第79頁。
- ⑦ 張正軍：《淺談武者小路實篤和周作人的人道主義文學》，《現代日本經濟》1989年第2期。
- ⑧ 川合康三：『桃源郷 中國の樂園思想』講談社、2013年、8頁。
- ⑨ 川合康三：『桃源郷 中國の樂園思想』、201頁。
- ⑩（美）莫里斯·邁斯納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頁。
- ⑪ 丁文：《“鄉間風景”的發現—周作人早年文學觀念與散文文體的生成》，《魯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5期。
- ⑫ 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號，1920年4月1日。
- ⑬ 魯迅：《頭發的故事》，《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65頁。
- ⑭ 魯迅：《致錢玄同》，《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79頁。
- ⑮ 細谷草子：『五・四新文學の理念と白樺派の人道主義』、中國文藝研究会編『野草』1號、1970年10月。

体上的努力^①。

事实上，中国新村运动的实践者主体与武者小路实笃以及周作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有着重大区别。

第一，中国新村运动实践者们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强调服务于民众和国家。李大钊提出：“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由此，他也将自我与世界联系起来。他希望少年中国运动，“是打破智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②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谈到办共产生活的自修大学时说道：“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③ 周长宪也提出：在中国搞新村运动的人，“他们虽在新村中生活着，可是并没有忘记社会中底（的）全体人民；他们千方百计地接引他们底（的）同胞，使之脱离苦海，共建天堂”^④。在关于新村的讨论中，缪金源提出：新人要留在旧社会进行斗争，“我们要霸占住这个旧村，时时扰乱他们，麻烦他们，做他们的当头棒喝；教他们不得不抛弃了旧生活，来和我们同过新生活”^⑤。

改造国家与社会是中国新村试验者们的首要目标。恽代英、林育南等组织的互助社，每次开会都要读《互励文》，内容有：我们“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⑥。胡业裕也在给恽代英的信中说：社团是研究改造方法的，可作大群众运动的大本营，利群书社就是一个社团^⑦。

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五四”青年们把改造社会与自己幸福连在一起。恽代英等人认为：“我们一切帮助社会的法子，无非是帮助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要社会越进化，便自己越有幸福。”^⑧ “所以我们的新生活不是只顾小己幸福的，我们的营业更不是只顾牟利的”，要“永远向社会开发”^⑨。恽代英主张通过新村来打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大家合力，“不但解决自己及家庭生活问题，而且要有力量与资本家决斗……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

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⑩。

改造社会更离不开发动工人阶级。上海的沪滨工读互助团在成立之初，其成员中就有人认识到团结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主张联合工人阶级共同奋斗。其中，袁笃实就主张：要“首先联络的分子必从社会中一般工人起”^⑪。

五四时期，还有人从中日国家关系的角度对于武者小路实笃强调“爱人类”，主张个人和国家觉醒，却又回避评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做法提出批评，希望他对于尚未觉醒的日本“多敲几下”^⑫。

第二，中国的新村实践者明确否定了新村主义中的个人主义成分。恽代英批评了其利己本能倾向，指出：“新村的运动，虽不纯然起源于寻求个人幸福的动机，但因为利己的本能得了个合宜孳生的场所，利他的本能因为遇不着适当的刺激，遂得不着适当的生长，所以精神每易太趋重了对内的完成，太疏忽了对外的发展。”^⑬ 他后来说道：“我们信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⑭ 他在致刘仁静的信中强调说：

- ① 樋口進 「周作人試論」、『目加田誠博士還曆記念中国学論集』株式会社大安、1964年、367—370頁。
- ② 李大钊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3—14页。
-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8—429页。
- ④ 周长宪 《新村生活底解剖》，《民国日报·批评》1920年第4期。
- ⑤ 缪金源 《新村与新人》，《民国日报·批评》1921年第6卷第2期。
- ⑥ 《互助社的第一年》，张允侯等编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23页。
- ⑦ 《业裕致代英》，张允侯等编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72页。
- ⑧ 恽代英等 《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34页。
- ⑨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35页。
- ⑩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96页。
- ⑪ 袁笃实 《沪滨工读团进行计划的个人主张》，张允侯等编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64页。
- ⑫ 浪工：《「工学主义」与「新村」》，《工学》1920年第1卷第4期。
- ⑬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251页。
- ⑭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96页。

“我自信我们今天所说的，不是武者小路的新村，亦不是福利耶的大合居。”^①

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个人主义便被逐渐放弃。根据金观涛等人所作的观念史研究的相关数据分析，在《新青年》杂志中：“‘个人’一词的使用在1921年后明显减少，而对‘个人主义’的评价在1919年前为正面居多，1920年后则明显倾向负面。”^②在当时从寻求个人自由到走上改造社会的转变已经成为时尚^③。

第三，中国新村实践者是为改造社会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武者小路实笃主张“爱他”的同时不能损害到自己，反对为他人牺牲。但是，李大钊却明确说：“实行这个‘爱’字，必须有牺牲的精神。爱人道，便该为人道牺牲。爱真理，便该为真理牺牲。爱自由，便该为自由牺牲。爱平等，便该为平等牺牲。爱共和，便该为共和牺牲。爱的方法便是牺牲，牺牲的精神便是爱。”^④武者小路实笃提倡自他互助与互利，但又强调不能埋没自我。恽代英却认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道德要求，“因为这是一种活泼有兴味的工作”^⑤。只有能为真理牺牲的人才能彻底改变社会。

总之，五四时期立志改造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最终认识到个人主义的新村方法是行不通的。陈独秀就说：“在全社会底（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的）余地”，因而新村运动就是“痴人说梦”^⑥。

三、新村主义与社会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者和中国的新村运动实践者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武者小路实笃倡导新村运动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和暴力革命的发生。而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新村实验，是在探寻改造社会道路时的一种摸索，根本没有事先预防社会主义的想法。相反，当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他们很快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放弃了新村主义。

武者小路实笃倡导新村主义是为了缓和和社会矛盾，他很早就发现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的“金钱分配不合理”和“种种不公平”。他担心“或迟或早革命会在世界上爆发”。^⑦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两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和平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他曾表示自己“不愿意看到发生革命，在东京出现满地尸体的景象。但是，劳动者在无法喘息地生活，难道就没有拯救可怜人们的和平手段吗？”^⑧他对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是明确反对的，表示：“我并不赞赏俄国过激派那样的用金钱势力和暴力把人们变成奴隶的做法。”^⑨为了防止革命的再出现，他警告说：“如果准备怠慢，革命就会必然发生，如果害怕革命的话，就只有让人们能像人一样地生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⑩而他找到的最好方法就是新村，也就是“不使用暴力创造新世界，而是依靠人类理性、爱、理智等”实现理想社会^⑪。不过，他的一些想法与社会主义确有相似的地方，他曾说：“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不过，我在劳动者和无产阶级不能像人一样地生活这一点上是有同感的。”^⑫

资本主义不好，社会主义恐怖，只有建立新村才是出路，这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基本立场。有日本学者指出：武者小路实笃建立新村“其外在原因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武者小路实笃害怕阶级斗争，提倡依靠“爱”和

①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262页。

②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③ 参见杨念群《“五四”九十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67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63页。

⑤ 《恽代英日记》，第645页。

⑥ 《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58—59页。

⑦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新潮社、1918年、251頁。

⑧ 奥脇賢三『検証「新しき村」』、37頁。

⑨ 奥脇賢三『検証「新しき村」』、40頁。

⑩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14頁。

⑪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36頁。

⑫ 『成長する星の群』大正一〇年七月号「六号雑誌」、奥脇賢三『検証「新しき村」』、336頁。

“善意”来缓解社会矛盾。^①他这样做，“其一是希望人们从制度和金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建立合理的共生社会；其二是摆脱自己寄生阶级的欠债。达成这种愿望的道路本来已有托尔斯泰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他既与托尔斯泰主义诀别，也不追随社会主义，要在以上两种道路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武者小路的共生农园主张。”^②

武者小路实笃曾经反复强调新村不是社会主义。1920年9月，他在《新村与其他主义》中就说“新村和社会主义那（哪）里相同？那（哪）里不同？”由于自己并不了解社会主义，所以不好回答。“但是，社会主义与新村相同的部分就是社会主义好的地方，与新村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主义不好的地方。”他还说：“我们较之于共产主义更应该是合作主义。”^③而“我对于社会主义所担心的是把现在劳动者的劳动剥夺去，代之以只给予食物”^④。后来他曾说：“对于共产主义国家我们带有不信任是由于其强制的方法。”^⑤

武者小路不但否认新村是社会主义，还强调新村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也不相干。他说：“我对到现在还把新村当作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感到吃惊。”他认为新村的特征就是顺应人类自我内心的要求，认为“全部都在寻求生存之道，这是来自人类内心的要求”，“顺来自内心的要求怎么能看作是空想社会主义呢”？^⑥

新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要不要搞阶级斗争，武者小路实笃明确宣布新村不搞阶级斗争。他在1920年12月制定的《村的精神及会则》中说：“我们是兄弟姐妹。”“不搞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的斗争。”^⑦他还说：“现在有许多人认为阶级斗争是创造正确、理想社会的捷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那么想”。^⑧他主张新村不参与政治，实行非暴力，认为“新村无论多么兴盛也要超越政治。只是成为良民。对于暴力的抵抗只是高举真理。我们是和平的民众。我们为了真理也要避免使用暴力和金钱。要打动他人的心灵只有依靠真心”。^⑨

周作人也强调新村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同。

1920年11月他在天津演讲时就说过，新村“并不属于某派社会主义；只是从良心的自觉上发出的主张”^⑩。他的著名新诗《小河》充满了“忧虑”的心情，^⑪就是害怕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大变革^⑫。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中国新村运动的实践者并不相同。

对于武者小路实笃这种用新村来回避革命的想法，当年不只是周作人一人。郭绍虞也认为：“新村组织的起因，就是感到社会主义的潮流，觉得现社会有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因此从事于改革的方法……他们要想免去暴烈的改革，所以援引互助的公例，才有这种平和的结合。这种结合，只有可以缓和激烈的运动，绝对不会发生扰乱的。”^⑬当年还有人主张在社会主义之外，首先进行新村试验，认为如果成功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⑭。对于周作人等人的这种想法，有学者指出：他们在强大的革命

① 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实笃研究 - 实笃と新しき村』、9頁。

② 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实笃研究 实笃と新しき村』、9頁。

③ 武者小路实笃 『新しき村と他の主義』（1920年9月）、收入武者小路实笃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黒潮社、15頁。

④ 『新しき村の生活』、6頁。

⑤ 武者小路实笃 『新しき村は空想社会主義に非ず』（1962年6月）、武者小路实笃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14頁。

⑥ 武者小路实笃 『新しき村は空想社会主義に非ず』（1962年6月）、武者小路实笃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13頁。

⑦ 大津山国夫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誕』、22頁。

⑧ 渡辺貫二編 『武者小路实笃 新しき村の誕生と生長』、96頁。

⑨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辺貫二編 『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56頁。

⑩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⑪ 钱理群 《周作人论》，14页。

⑫ 参见姜涛 《从周作人的〈小河〉看早期新诗的政治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⑬ 郭绍虞 《新村研究》，《新潮》第2卷第1期，1919年11月。

⑭ 南星 《新人的环境创造》，《新人》第1卷第1期，1920年4月3日。

潮流面前又本能地感到恐惧，乞求于阶级调和论，妄图通过说服宣传使不劳而获阶级幡然悔悟^①。他们的这种想法在中国显然很难行得通。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是不是属于社会主义？我们还可通过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者对新村主义的批评来加以印证。日本早期著名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在1916年3月号的《新潮》和1918年6月号的《中央公论》上曾发表文章批评新村主义。他说：“武者君（即武者小路实笃）对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持反抗的态度，是我们最希望的。”但是“把实现理想社会的手段放在‘理性与爱’上，说是不想使用暴力。但是德川幕府是怎么倒台的，是用‘激烈的北风’，还是‘温暖的阳光’，一看就会明白的”。^②在1918年7月号的《新日本》上，社会主义者山川均也发表文章说：“武者小路的新村理想预先告知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仅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且是作为与其对立的思想而提出的。”^③显然，在日本，新村主义也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们在探索实现理想社会的方法时，也逐渐认识到新村主义的和平、渐进方法是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只有开展民众革命运动才能达到目标，这体现在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认识过程中。对于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有一个从担心到接受的转变，这也就是他们对新村主义从信仰到抛弃的过程。

李大钊在开始时认为实现理想社会，阶级斗争和互助合作两者都是必要的。1919年7月6日，他在《每周评论》的文章中一方面引用拉斯金（Ruskin）的话说：“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另一方面，他又引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他主张：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而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④但是，后来他坚定地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当年，在利群书社成员之间，对于是否采

用阶级斗争手段也有过很多讨论。胡业裕在致恽代英信中就已经意识到进行激烈革命的必要性，表示：“以前我对于改造社会之态度，只顾目的，不管手段……李宁我既不反对，武者小路亦我所赞成。”但是，后来他提出：“与其希望于年后，何若及身得到光明的幸福。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的态度稍有变动……和平的引导，实在不如激烈革命。你看李宁和武者小路氏是谁的能力经济？”恽代英则在回信中顾虑到革命的破坏性问题，强调了组织团体的重要性，并且认为革命只是最后手段。他说：“群众弱点只能利用去破坏，不能利用去建设。所以在破坏的事纵然极顺遂的前进时，不可不有极真诚、极切实的团体去在背后做建设的事。”^⑤他还说：“我为革命的事，与仁静在北京争论经月，他笃信流血，我总想避免他。”^⑥但他最终认识到：“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⑦除了胡业裕和恽代英，利群书社其他成员也认识到新村是改造社会的一种建设方法，可以预先缩小将来战争的范围，但绝对不流血是办不到的^⑧。

经过交流讨论，利群书社成员最后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1921年7月中旬，恽代英和林育南、李求实等在黄冈浚新小学决定成立“共存社”，在其宗旨中明确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⑨。将实行阶级斗争作为首要手段。到1922年，恽代

① 钱理群《周作人论》，第13页。

② 奥脇賢三『検証「新しき村」』、117—118頁。

③ 原题「社会主義者の社会観」，后以「文芸家の理想村」改题收录于『山川均全集』1、勤草書房、2003年、531頁。

④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54—356页。

⑤ 《代英致业裕》，《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70页。

⑥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247页。

⑦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169页。

⑧ 参见梦良《新村批评》，《评论之评论》1卷1号，1920年12月15日。

⑨ 《恽代英传记》，第60页。

英对于新村方法已经完全失望。他说：“有些人以为办新村，改良家庭，改良市政，改良固有的学校与工厂，有了好社会，才可以有好国家。但是在这种群雄争长的局面之下，生活是日益困难而不安定的”，新村主义也无法实现^①。

如果说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已经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感觉到这条路行不通，那么上海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最终解散，便使得青年知识分子彻底认识到：在旧的社会制度没有被打破之前，工读互助团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更不能以此来改造社会。沪滨工读互助团的解散宣言说：“失学青年固不可依赖于家庭，更难求助于社会。换言之，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决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决没有自立求学的机会。”^②对于工读互助方法的绝望，正是他们其后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契机。1922年7月，高君宇在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上发言指出：“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思（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思）主义。”^③这里，他明确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瞿秋白也坚决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运动，并认为它“不致（至）于象（像）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园’”^④。社会主义虽然在民国初期已成为一种主流思潮，^⑤但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与新村运动的失败密切相关的。

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并开展革命运动就必须组织新的团体，这就是中共诞生的历史背景。李大钊认为：工读互助的失败，“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贫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⑥。于是，他便开始筹备建立新型政党。

工读互助运动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走上科学社会主义。但并不能说，中国新村主义者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蓝图也就此放弃。其实，他们虽然抛开了新村主义，却并没有忘记对于美

好理想社会向往、追求的初心。正如沪滨工读互助团解散宣言中所说的：“我们这团体的形壳虽遭破产，而我们的工读互助的精神终久还要磅礴的发展。”^⑦确实，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是他们终生奋斗的动力。

四、制度化的新村与理想化的新村

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未来美好社会充满强烈的愿景。他们在实践新村主义时极为理想化，因而在新村实验过程中一些做法过于超前，曲高和寡，这是导致新村失败的内在原因之一。而日本新村在建立之初就注意到制度设计的实用性，有土地财产保障，故得以长期留存下来。

武者小路实笃为建立新村，事前进行了周详的准备，包括购买土地、认真招募参加者、制定具体规则等。他强调：“土地和住房是第一必要的”，^⑧并在资金上有所准备。在《新村对话》等文章中，他对新村生活特别是在共产与私有、集体生活与个人自由以及新村中的夫妻家庭等问题上都有过深思熟虑。

第一，日本新村虽然实行共产生活，但是也承认一定程度的私有，即“土地全部共有，但也允许一定范围的私有”^⑨。武者小路实笃说：“我不认为理想社会里的所有一切都有必要共产。连绵山脉的山麓是共有的，但是孤立高耸的山峰是突出起来的，这部分可以私有。对于健康必要的衣食住以及其他必要的部分实行

① 《恽代英文集》上卷，第338页。

② 《呜呼工读互助团宣言解散》，《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70页。

③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高君宇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4—65页。

④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⑤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

⑥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71页。

⑦ 《呜呼工读互助团宣言解散》，《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71页。

⑧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39頁。

⑨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42頁。

共产。一定的自由时间也要共产。一定的教育所必须的东西、一定的娱乐也有必要都可无偿得到。但是，那些不涉及到全体和所有方面的东西，不是非有必要增加义务劳动时间的东西则不实行共产。”他认为：在新村，“关键的是只有自己与所有人都共通的物质需要才应该共产”。^①日本新村开始时要求加入者把以前的全部钱财都交给新村，后来则改为入村之前的钱财可以继续归本人所有和支配^②。

关于新村的财产分配，武者小路实笃主张：“如果生产的东西超过本村需要，可以卖给别村。将其收入分成三份。一部分按人均分，一部分作为村的储备，其他用来村的发展。”^③也就是说，新村内一部分收入可以私有。对于村内福利也不是一刀切。例如，“在新村医院看病，交钱和不交钱的待遇一样”。^④对于新村公产的经营，则必须尊重每个人的意志，但“资本的使用方法，由会议决定，七成可决定的话，只能用七成的钱办事，即便有一个人反对也不行”^⑤。

第二，新村的集体生活要尊重个性、并允许一定范围的独立和自由。武者小路实笃说：“那个社会没有必要个人为了个人而牺牲，都是独立的。”^⑥在新村中，“个人只被义务所束缚，而不能为他人所束缚”^⑦。新村实行轮流做饭，一个月一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自己做饭。可以在食堂吃饭，也可以在家里吃饭。^⑧实行集体生活，也要尊重个人生活习惯。在共同生活的同时，大家都安闲，都随便。想一个人时，就随便一个人独处。不想见面时，放下帘子一个人午睡也可以。互相自由融通。他特别强调要“尊重他人的心情、时间和劳动”。^⑨

武者小路实笃认为平等就是指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平等不是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平等，而是行动自由。他主张“理想的社会是双方都能生存。是立于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就是平等”^⑩，这是“因为新村只是大家都在地平线上生活，各自的准备、决心、天分、性格都不同”，应尊重个性。但是，他承认在集体生活中，个人的努力和良好的脾气禀性会得到赞

赏。“为村子作出贡献的人比没有作出贡献的人要受到尊敬，聪明的比愚蠢的要受到尊敬，脾气好的比郁郁寡欢的人更被喜爱这是当然的。”^⑪

第三，对于家庭，武者小路实笃主张在新村中实行一夫一妻制，夫妇一同或分别参加新村活动都可以^⑫。在新村中，“夫妇一同为新村发挥作用或夫妇分别发挥作用都可以”^⑬。对于家庭与新村的关系，武者小路实笃承认人们对于家庭的关爱会高于新村，但不允许为了家庭而在新村谋利。他主张：“不是因为新村而有夫妻，也没有因为夫妻而有新村。相对于新村更爱丈夫或更爱妻子，这是自然的。但是，为了丈夫或妻子而利用新村以及兄弟姐妹的则不允许。”^⑭

关于村内两性关系，武者小路实笃没有提出特别规定。但他强调：两性关系不应该破坏到村内秩序。他说：关于新村的男女关系，“我没有特别的意见。不提出男女应该怎样”，只要“不破坏村内和平，不破坏村里勤劳气氛，不给他人带来不愉快就可以”。^⑮

与日本新村相比，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们在建立工读互助团时，却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他们主张绝对共产，实行完全一

- ①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边贵二编『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42頁。
- ② 笔者对新村成员川边贤一的访问记录（2015年2月21日）。
- ③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51頁。
- ④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53頁。
- ⑤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43頁。
- ⑥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42頁。
- ⑦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边贵二编『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43頁。
- ⑧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47頁。
- ⑨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53—54頁。
- ⑩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边贵二编『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43—44頁。
- ⑪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边贵二编『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30—31頁。
- ⑫ 武者小路实笃『新しき村の生活』、55頁。
- ⑬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边贵二编『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100—101頁。
- ⑭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边贵二编『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101頁。
- ⑮ 武者小路实笃著、渡边贵二编『人間らしく生きるために 新しき村について』、102頁。

致的集体生活，并准备废除家庭。周作人在介绍日本新村时，重点在新村精神、理想方面，对于武者小路实笃关于维护新村生活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却几乎没有提及^①。这就给了中国新村运动以畅想和发挥的空间。但是，由于工读互助团彻底共产、缺乏周密的制度设计，激情退潮之后面临经营困难，加上情感问题出现时，新村便无法继续维持。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是实行绝对共产，要彻底铲除私有制。西方启蒙运动把私有财产作为人权的基本内容，但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却强调私欲会损害公共利益^②。例如，恽代英说：“我们很觉得私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们要使生活有兴趣，应该渐使我们接近为自由工作的世界。”^③他认为：一切问题“只要能破除私产制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废除金钱，便一齐解决了”^④。

本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利”“义”对立的观念。到了五四时期，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禁欲主义和中国泛道德主义相结合^⑤，更使得青年们普遍崇信道德力量，仇视私有。例如，施存统就主张绝对共产，并从母亲生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来论证实行共产的必要性。他说：“假使共产的时候，有公共的医院，则吾母病起的时候，就可以入院医治，何致有临死还不明白什么病的事情？”^⑥他认为：“共产问题，是我们第一组工读互助团精神改变的一大关键；试验新生活的主张，也从这一次决定。”^⑦本着这样的理想主义，工读互助团的共产实验其实都很随意。傅彬然就回忆说：他们“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就可以自由捡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⑧

其次就是工读互助团制度不完备，导致经营不善，无以为继。由于没有完善的制度规定，每个团员的个人努力程度不同、责任义务不明，加上不会经营，导致入不敷出，工读互助团往往遇到财务困难，最后不得不解散。施存统就反思说：“我们试验共产失败，只是受经济的压

迫”，^⑨但失败的原因还有“能力的薄弱”^⑩。他所认为的这种能力就包括组织生产和经营能力。1920年4月，《新青年》上发表一组文章，以总结工读互助社的失败教训。其中，胡适认为：是没坚持工读原则，“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⑪。李大钊则认为在都市建立共同生产的组织很难，建议“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⑫。施存统则认为经营状况恶化是主因，“感情融洽只能增加生活上的愉快，到了面包问题发生的时候，感情决不可以去解决他”^⑬。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兄弟三人组成的类似“新村”的“文学合作社”到1923年也解体了。周氏兄弟反目的原因虽有诸说，但是围绕经济收入与使用上的矛盾，确实是重要因素之一。^⑭

- ① 1919年4月，周作人发表的《日本的新村》，主要摘抄武者小路关于新村精神的论述，但是对其承认私有、尊重个性和保存家庭等具体规章却并未提及。
- ② 参见高力克《〈新青年〉经济伦理变革及其限度》，刘小枫等编《经济伦理与近现代中国社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74页。
- ③ 恽代英等《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35—136页。
- ④ 《恽代英日记》第647页。
- ⑤ 王中江《化解“义利”的紧张：严复的经济伦理》，高力克《〈新青年〉经济伦理变革及其限度》，两文均收入刘小枫、林立伟所编《经济伦理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一书。金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99—300页。
- ⑥ 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我》，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35页。
- ⑦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2页。
- ⑧ 傅彬然《忆北京工读互助团》，《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94—495页。
- ⑨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6页。
- ⑩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5页。
- ⑪ 胡适《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0页。
- ⑫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79页。
- ⑬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6页。
- ⑭ 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第138—147页。

再次就是集体生活中的觉悟、决心和相互适应的情感问题。王光祈在致恽代英的信中说：“经济破产之原因又多由于团员不肯努力或和衷共济之故。”^① 俞秀松认为：关键原因还是“工作不尽力”，“不肯协力商量办法”^②。可见，他已经关注到团员的同心协力、相互适应问题。当时的理想主义青年热衷于追求一种至高至纯的崭新社会，但是由于各人的利益、觉悟和决心不同，便导致离心离德。施存统后来深刻总结说：当初在互助团筹备时，就有人不同意共产，“幸而这几位不赞成实行共产的团员，自己愿意退团，让我们试验新生活，团体才不致（至）于破裂”。但是，“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一人”。其结果，“我们从开办到破裂，前后三个月，做过团员的共有二十一人；而到破裂的时候，只有团员十一人”。^③ 互助团刚成立时大家热情很高，但“直到彼此感情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于是对于工作发生极大的变化，顿时感觉没有兴味”^④。此外，还有集体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相互适应等情感问题，“像工作不如意、读书无定时、彼此少谈话、没有共同娱乐、性情不一样、态度欠和平、言语欠诚恳，这些都是促成感情隔阂和精神涣散的小原因”^⑤。

对于理想社会的家庭婚姻问题，与武者小路关于新村中家庭的观点不同，中国的新村实验者非常激进，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特定时期相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探索理想社会时，还有彻底清除掉封建伦常的重要课题，这集中体现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当时，取消一切差别和束缚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例如，蔡晓舟就提出“幸福均沾”，要打破男女阶级、智愚阶级、资本制度、国与家的障碍。^⑥ 施存统回忆说：“我们那时的理想：凡是理想社会所当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做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得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⑦ 他们提出要解决六大问题即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绝对实行共产、男女共同生活、暂时重工轻读^⑧。

五四青年知识分子还主张取消姓氏。利群

书社成员林毓兰在通信中说：他“觉得‘姓’这个东西，实在是女子人格的敌人。要求女子解放，非把他去掉不可”。他提议：今后“除敷衍家庭以及亲族不能不用姓外，凡一切须用姓名之处，均去姓而用名”。^⑨ 甚至蔡元培也主张取消姓氏、废除婚姻。1930年，他曾设计出这样的新村生活：姓氏“不要的好，用父的姓不公，用母的姓也不妥当，还是不要的好”。“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结婚为好。”家庭也是“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⑩ 当然，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激进想法，主要是在反封建狂飙席卷的这一定背景下的呐喊。后来，他们的婚姻家庭观有了改变。

理想主义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主观动力，但是实现崇高理想需要经过不同阶段，更要适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否则仅仅依靠实现美好理想的激情，急于求成，往往会适得其反。另外，在集体生活中还应尊重个人自由，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家庭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依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对于当时工读互助团的超前做法，王光祈就曾批评道：“我们只要在团中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不必依赖家庭之供给罢了，又何必定要做出形式上之脱

① 《王光祈致恽代英》，《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42页。

② 俞秀松对于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的跋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41页。

③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2页。

④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4页。

⑤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4页。

⑥ 蔡晓舟：《文化运动与理想社会》，《新人》第1卷第4期，1920年8月18日。

⑦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3页。

⑧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试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25页。

⑨ 《毓兰致卢斌》，《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79—180页。

⑩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第404—405页。

离家庭，废除姓氏及团员所有私财均作共产等等花头！他们那时很有笑我不彻底的样子。其实中国人的毛病，便是说得很凶，其实做起来，又往往不能言行一致。”^①他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结 语

中日两国的新村主义无论是各自所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是社会要求，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当时日本经历了明治时代并走上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矛盾加剧。为此，日本新村是要通过自身示范用和平、渐进的方法改造社会，并把防止革命爆发作为主要目的。而当时中国则是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在封建主义依然残存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弊端又已开始显现，再加上民族危难的时局，使得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寻求彻底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们急迫地探索各种方法，这当中并不排除阶级斗争手段。

正是由于中日新村主义的时代背景存在差异，导致了其在两国所发生的影响和结局也不一样。日本新村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自我”、“善意”和“爱”，主张共产的同时也承认一定程度的私有，尽力不去触动原有社会秩序，因此虽然历经90余年依然存留下来，不过其社会影响却日渐式微。而中国新村主义的实践者们对理想充满激情，他们为了社会和国家不惜牺牲，以改造整个社会为己任。他们顽强不懈地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而正是以新村运动的失败为契机，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成功。

（本文作者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教授 日本国 851 - 2195 长崎県西彼杵郡長与町まなび野 1 - 1 - 1）

（责任编辑 王志刚）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44页。

纪念抗联“八女英烈”牺牲8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伟大的抗联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凝聚各方面力量，积极致力于现代化牡丹江建设，牡丹江市委决定于2018年9月2日、3日举行纪念抗联“八女英烈”牺牲80周年系列活动，并举行主题征文活动。有关事宜如下：

一、征文主题：八女英魂、光照千秋。

二、征文内容：（1）“八女投江”的事迹和伟大意义。（2）“八女英烈”人物研究。（3）“八女投江”与抗联精神研究。（4）“八女英烈”与龙江地域文化研究。（5）东北抗联精神的时代价值。（6）抗联精神的内涵及其形成发展。（7）抗联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8）抗联对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9）继承和发扬抗联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春。（10）“八女英烈”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11）缅怀“八女英烈”，当代妇女新时代再立新功。（12）缅怀“八女英烈”，为老区（林口）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13）缅怀“八女英烈”，为牡丹江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14）传承“八女英烈”精神，优化龙江营商环境。以上选题供参考，亦可自拟题目。

三、征文体例：叙事性或议论性文体。

四、征文要求：（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观点正确。（2）用语准确，论述严谨，体现学术性。（3）提倡“短、实、新”文风，以5千字左右为宜，一般不超1万字，并附300字以下的内容提要、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4）引文应注明出处，采用页下注。（5）征文投稿注明“纪念抗联‘八女英烈’牺牲80周年征文”标题、原则上以电子邮件为主，以附件形式上传文档。

五、评选奖励：（1）征文活动将评选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并颁发证书。（2）获奖征文将在市直主要媒体、期刊、网站刊发。（3）获奖征文作者，将受邀参加“八女英魂、光照千秋”主题座谈会。

六、截稿日期：2018年8月15日。

七、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mdjdsyjs@126.com；0453-6171104 殷光涛。